

(上接第一版)“‘吕志和奖——正能量奖’颁发给我,既是对我个人的表彰,更是对敦煌研究院同仁们75年来为莫高窟保管事业艰辛探索进取的激励。保护、研究、弘扬敦煌莫高窟任重而道远,守护莫高窟是值得奉献一生的高尚的事业,是必然要奉献一生的艰苦的事业,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奉献的永恒的事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樊锦诗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阅兵典礼和群众游行。我问她的观感,她坦诚地说:“说实话,城楼离广场那么远,我看不清什么,但内心的确为咱们国家的蒸蒸日上充满了自豪感和喜悦之情!”我猜想,望着万众欢腾的盛大场景,她此时脑海里翻滚的还是在莫高窟的日日夜夜,是三危山的佛光,是九层楼的铃铎,是259窟的禅定佛和158窟的涅槃佛;当然还有她和夫君彭金章先生共同的神圣誓言:“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正如她自己所说的“躺下醒来都是莫高窟,梦中也是莫高窟”,敦煌莫高窟的文物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依托、生命的全部。这些,在这本“唯一自传”中已有朴实而生动的叙述,毋庸我在此赘述了。

## 中国“舍身求法”的坚挺脊梁

回到法兰西学院金石美文学院“第二届汪德迈中国学奖”的颁奖现场。樊院长在领奖答辞中说:

莫高窟石窟开窟和造像的历史,是一部在戈壁荒漠中营造人类精神家园的历史,是一部贯通东西方文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谋求发展和繁荣的历史。西汉王朝的张骞全线打通了中国与欧亚大陆之间的交通,此后这条“陆上丝绸之路”繁荣千年之久。灿烂瑰丽、博大精深的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是中西文化和多民族文化交融荟萃的结晶,是不同文明之间和平共

处、相互交融、和谐发展的历史见证。

汪德迈先生发起设立“汪德迈中国学奖”,旨在“吸引更多目光关注和理解中国的历史文明及其进程”。我认为这一思想有助于推动西方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有利于加强21世纪东西方的交流和理解,有利于守护人类的文明和世界的和平。

汪德迈先生在颁奖辞中对樊院长的成就赞赏有加,其中特别称道2011年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意义非凡。这部樊院长主编的曾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巨著,是她带领敦煌研究院的同事花费40年的心血撰写而成,在中国石窟考古学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创新价值。

这次颁奖前夕,在巴黎居住的宾馆房间里,樊院长从宿白先生的《敦煌七讲》和宿先生对她的多次催促,到苏秉琦先生在她毕业离校前的殷切叮咛,从日本学者早年的《云冈石窟》调查图录,到她拟写第248窟的考古报告初稿的尝试,就完成此考古报告的艰难与意义,对我侃侃而谈了近一个小时。樊院长指出:要做一部准确记录不规则形状洞窟全部遗迹的石窟考古报告,使之成为能够真正永存的敦煌石窟科学档案资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困难重重。经过多年的艰难摸索,她和同事们首先解决了编排和体例问题,又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测量手段和测绘方法,将最先进的测绘技术运用到考古工作中,实现了石窟考古测绘的重大突破。她说:“我们的考古手段、考古工具、考古理念、专业分工都有很大的进步,21世纪数字信息的发展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我们可以做出很多前人无法做出的成果。这一卷考古报告打破了过去仅限于文字、绘图和摄影结合的方法手段,融汇了考古、历史、美术史、宗教、测量、计算机、摄影、化学、物理学、信息资料等多学科的方法手段。第一卷考古报告的编写出版,使永久保存、保护敦煌莫高窟

及其他敦煌石窟的科学档案资料,推动敦煌石窟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满足国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对敦煌石窟资料的需求,甚至在石窟逐渐劣化甚至坍塌毁灭的情况下,提供为全面复原的依据,成为可能。”然而,她也深知,40年磨成一剑,期间甘苦自知,而要将全部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都完成,恐怕还需要几代莫高窟人和其他考古工作者齐心协力、集思广益、孜孜不倦的艰苦努力,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敢于创新。她听说我国学者自己编著的《云冈石窟全集》刚刚由青岛出版社印行推出,非常关切地询问该书的编撰情况,也希望敦煌石窟第一卷的考古报告能为推动其他石窟寺的考古工作提供借鉴。

从10月14日到18日,樊院长这次在巴黎总共只停留了4昼夜零9个小时,除了不多的睡眠、用餐时间,就是集中精力静心准备获奖答辞和学术讲演稿。10月17日下午,她在法国远东学院做了题为《玄奘译经和敦煌壁画》的演讲。尽管所讲是她稔熟的内容,考虑到中外听众不同的文化学术背景和法文翻译的需要,她和远东学院的郭丽英教授以及翻译者一遍又一遍地梳理、提炼讲稿,制作PPT。在讲堂上,我听着她对玄奘西行求法、东归译经内容和意义的诠释,看着屏幕上播映的榆林窟第三窟等壁画中玄奘、孙行者和驮经白马的图像,马上联想到这本自传中写的一段话:“这么多人来到敦煌,守护莫高窟,每天都要和佛经、佛像照面,他们的精神来自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热爱和对这份事业的执着追求。这个追求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和佛经徒的信仰非常相似,因为这也是一个需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需要不断超越、获得智慧的过程。”于是,我耳际不禁又响起了鲁迅称颂“中国的脊梁”的名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

往掩不住他们的光彩,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想到,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莫高窟人”,不也正是我们中国舍身求法的坚挺脊梁吗!

## “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在“汪德迈中国学奖”的颁奖仪式上,樊院长平静而简朴的语句回响在法兰西金石美文学院的大厅:

我是一名中国的考古学者,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守护和研究世界文化遗产地——“敦煌莫高窟”。我在敦煌度过了近60年的时光,我个人的考古研究和莫高窟的保护事业是不可分离的。

从听众们热烈的掌声里,我感觉到这朴素答辞里蕴含的丰富内涵,感受到一种净化心灵、启发心智、鼓舞人心的强烈感染力。

10月22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我心归处是敦煌》的读书会上,叶刚教授等几位专家高度评价了樊院长的功绩和这本自传的价值。他们还特别指出这本书封面上樊院长的照片淡定、安详、慈善,真好!我看到,书的护封上印着她的一句话:“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书的封底印着她的另一句话:“我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书的结尾处写道:“衰老和死亡是自然的规律。其实真正让人感到悲哀的是人生有许多遗憾无法弥补,真正让人感到恐惧的是不知心归何处。”书中所突显的一颗星、一件事、一辈子,就是热爱祖国文化事业的赤子初心,是保护莫高窟文物的使命在肩,是扎根敦煌大地的绿树长青。

我想,出版这本自传,也是这位81岁老专家树立的新起点、新标杆,是为了继续讲好敦煌故事,传播祖国母亲声音,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创新者,这就是这位“敦煌女儿”的心声。

# “他们的人性比我们深刻得多……”

——王安忆说母亲茹志鹃

■子张

像茹志鹃、王安忆母女二人同为当代重要小说家的例子,想来想去想不出之二。从我在大学期间听当代文学课程时起,就是这样,不过那时候母亲茹志鹃似乎是重心,《百合花》是课堂上必讲篇目,我也从图书馆借来《高高的白杨树》读了。而作为女儿的王安忆,彼时还是一位“新秀”,以成名作《雨,沙沙沙》被介绍到课堂上来。大学毕业我去做中学语文老师,《百合花》风采依旧,也是高中生必学的课文。但是到1985年我返回母校讲授当代文学课程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尽管也还要讲《百合花》,而谈到茹志鹃,则增加了《剪辑错了的故事》作为反思文学的一例,此时女儿王安忆的《小鲍庄》《三恋》已然后居上,成为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标志性作品之一,课堂讲授的重心也就渐渐倾向女儿这边了。至于90年代以后,如同大家所熟知的那样,母亲从容淡出,女儿的园林则蔚为大观,再也无法叫人忽视了。

我目睹这神奇的星云交替万千气象,其实内心里也一直保持

着一份宁静的好奇,抛开名声、地位这些表面和世俗的因素,我真的很想有机会,听一听母亲说说眼中的女儿,或女儿说说心中的母亲。如此感性和私密性的口述“文学史”,一定会格外有些味道的吧?

现在,女儿开口了。2019年10月14日晚,在浙江工业大学屏峰校区图书馆报告厅,王安忆从母亲的祖籍绍兴说起,说到曾外祖父从绍兴到杭州创业且在杭州平安街建起大宅院的往昔。而提及外公,王安忆则以“不争气”三个字形容,家业便是在外公手里“败落”的,大宅院更是在1949年后搬入好多人,成了大杂院。母亲出生在上海,那是因为家业败落,不得不到上海投奔外婆的姐妹们,其实外婆祖籍在浙江南浔,姓庞,后来去了上海天祥里。

母亲三岁时长就去世了,故而母亲的经历中有寄身于杭州的“孤儿院”一段,这是让我感觉惊讶的。我只是通过《百合花》,猜测茹志鹃应该是军人出身,现在听王安忆介绍,才知道其母之所

以有新四军生活积累,乃是因为其大舅后来进了苏北的新四军部队,母亲茹志鹃不过是在走投无路时投奔大舅才神奇地成了新四军。王安忆对母亲的离家有“不能寄人篱下”的评语,且将母亲的身世与张爱玲小说《多少恨》比较,认为就跟小说里写的非常像。说到这里,王安忆提到母亲留下的日记,流露出对这部日记的无限珍惜,甚至说:“连陈思和都有点不舍得给他看!”而出于种种原因,日记迄今没有公开面世。

在王安忆看来,母亲从来喜欢文学,有着“凤凰山下读红楼”的回忆。在部队里经历了战争与和平,随部队过江,再后来进上海,这一切都蛮顺利,然而世事难料,到了20世纪50年代,身为新四军的父亲因为说了“国家养不起国营剧团,需要个人剧团”这些话而遭遇顿挫。父亲出身南洋华侨,性格大约是极为耿直的,这时候也是母亲茹志鹃《百合花》发表的时期,幸有茅盾先生在文章里对《百合花》作了非常高的评价,才似乎扭转了局面,不但是对母



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王安忆与父母合影

亲本人的肯定,也几乎是对全家的拯救。王安忆也由这个话题谈到个人和时代关系,对母亲写作的“家务事,儿女情”也作了自己的思考。她谈到了母亲恢复写作后的“自我平反”,也为母亲后来的“不写了”觉得“有点可惜”,而在她看来,母亲这一代人,“他们的人性比我们深刻得多。”虽然这其中的确也有着一些“局限或命运”的问题。

讲述母亲生活经历和小说写作的同时,王安忆也不断地穿插她自己对生活、对写作的看法,最后也对在场几位学生的提问作了积极的回应。比如她引述香港女作家黄碧云的话,提到“即便不写小说,还要生活”这样的观点。也通过个人去台湾访问时,诗人痲

弦对人细微的照拂,批评大陆男性的不懂规矩,或者所谓“没有样子”的那种傲慢无礼。又如谈到80后这代作家,王安忆大度地表示“他们才是主流”。但她也有着自己的理解,认为“文学不是青春饭,需要长期积累,慢慢形成自己的形象”。对长篇小说,她觉得不宜轻易触碰,甚至说长篇是个陷阱。而每种形式都有周期,小说的黄金期已过。有学生问到日记,王安忆回应说:日记是内心需要,不是写给别人的,没有价值。还谈到自己当年作为知青在苏北时“插队生活很苦”,但是,“写作使人愉快,是一种乐趣。”她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那天的演讲。或许从这句话里,读者可以发现作为小说家的王安忆似乎永不懈怠的秘密。